

洪光荣著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

洪光荣著 *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编 * 下册

全书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为限，以大致成书年代的先后为序，对当时中国古典文学的若干典籍予以源流上一个宏微兼具的理论盘点。

行文多以一人一书之相关介绍为单位各自成篇，

如《诗经》、《汉书》等，间亦有涉及一家多书或多家一书之例，如《建安七子集》等，其中以前者为全书主体。

每篇之内，既有关于某一要籍的解题与著录，力求行文严谨有效，间杂些许考证而多采方家成说；又有其书问世后的卷帙分合与版本沿革，重点介绍近百年来后人对相关要籍的整理和注疏。

为便于参考使用，全力收录如《论语词典》、《吕氏春秋词典》等工具书性质专著之同时，略古详今，略旧详新，尤其偏重1949年以来排印本的推介，而对近三十年以来的学术专著更详介其整理或校注体例。

木铎文库学术丛刊

贾勤 嵯家 主编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编

下册

洪光荣 著

《汉书》《班兰台集》

《汉书》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同时它与《史记》一样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散文巨著。该书除“八表”及《天文志》分别由其妹班昭、妹夫马续续补外，其余皆为班固一人写成。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生于公元 32 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公元 92 年（汉和帝永元四年）。班氏从小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又“性容众宽和，不以才能高人”，故为时人所重。由于《史记》所记仅止汉武帝时代，故如刘向、刘歆、扬雄、史岑等后起而续补者络绎不绝，但大都文辞鄙俗。班固父班彪有鉴于此，乃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著“后传”数十篇。虽其志未果而卒，但它为《汉书》的成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后班固承父志于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开始撰《汉书》，五年后被控私改国史而入狱。其弟班超于是上书解释，明帝阅后对其才智大加赞许而召其为兰台令史。故世又称其为“班兰台”。其后迁为郎、典校秘书。最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于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 82 年）将《汉书》基本完成。后来章帝升其为玄武司马，让其在白虎观中与诸儒讲论五经同异，成《白虎通德论》。至和帝时，因窦宪谋反事而坐连入狱，并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共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等一百篇。唐刘知几尝称：“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解。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史通·采撰》）清人赵翼于此，则未敢苟同，而又称班氏太初（汉武帝年号，前 104—100 年）之前，虽多用史公

原文，未必全同，不仅“移换之法，别见剪裁”（《廿二史札记》），且颇有增饰。藉此，章学诚乃谓：“固书以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文史通义·书教》）其所以如此，一在“班固述汉，虽因循史迁传体，宗旨实异”，一在“马、班虽皆为纪传之祖，其体似同而实异、似亲而实疏也”（汪荣祖《史传说》）。

就《汉书》的文学价值而言，其叙事一般不如《史记》那样生动、奇谲和富于变化，语言也不象《史记》那样明朗和浅显近人，即“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而是喜用古字，追求藻饰、明显受到当时辞赋与散文的影响。但其文字仍不失简炼整饬、详赡严密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后汉书》）。章学诚为此更称：“迁书体圆而神，多得《尚书》之意；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文史通义·书教》）是故，“风流倜傥之士，辄喜马文疏荡有奇，然班文亦自有其奇”（《史传说》）；至于郑鹤声所谓：“杨万里尝比马为太白，班为少陵，盖一则如仙翁剑客，一则雅士骚人也”（《史汉研究》），更着眼于以班氏之文为良史之文耳。譬如说，《汉书》中有不少传记即写得十分成功，塑造出不少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苏武的坚贞不屈、李陵的重己轻国、张骞的善于交际及朱买臣的得、失意时不同之态等。其中苏武是写得最为成功。它标志着《汉书》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极高水平。文中表现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德，通过了许多具体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如文中写到“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取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得以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至今千百年，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明茅坤即曾评此文“武之仗节，为汉绝盛事，而班櫟亦为汉绝世文”（《汉书评林》引）。

《汉书》中的许多“纪”、“传”大都采《史记》原文，并且前人还曾言“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剂书，

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葛洪《抱朴子》）；但作者在取舍之间也颇费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功夫，故并不能看作抄袭，而妄断其“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郑樵《通志》）。而《汉书》中随人物的叙写而附录了大量的辞赋、散文，虽多少影响到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的鲜明、突出，但又因此而保存了不少本已佚世的古籍佳作，从而既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保存出了一份不小的力，也为后来文章家提供了鉴戒和帮助而为世所爱。是故，“或许史迁文朴可喜，”然“观固自序，亦将以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诚足以媲美子长矣”（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

《汉书》，《旧唐书·经籍志》：“《汉书》一百十五卷，班固作；又一百二十卷，颜师古注。”《新唐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宋史·艺文志》：“班固《汉书》一百卷，颜师古注。”按：此书篇卷历经分合，著录互有异同，然又各有所本而皆不谬。《隋书·经籍志》所录，同《旧唐志》，或后者所本。另，唐以前注《汉书》者凡二十三家，颜师古《汉书叙例》有录，今皆佚。

关于后人对《汉书》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唐颜师古《汉书注》和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二书。前者博采东汉服虔、应劭以下二十余家旧注，并取其叔父《汉书批发择疑》而删繁就简，取精留长、并又删谬补缺，间有己之新见，看成一家之言，故又称《汉书集注》。该书考据精审，论证严密，对历史存疑或歧义处作出不易之定论；审音正字，辨析词义，言必有据，是研究汉语在六朝前音韵沿革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排印本。《汉书补注》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因其注“号为功臣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读伪误解释踳駁之处亦迭见”而欲以“区区寸心，颇谓尽力以疏伪之咎”并“补其阙漏，竟全力功其余得失之林”（《汉书补注·序》）。为此该书作者遍览了如宋淳化本，景德本，景祐本及乾道本等唐宋诸家刊本及陈和叔、邵文伯、谢克念、杨伯时、李彦中、张集贤、沈公雅、王性之等人藏本，还参校了汪文盛、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钱大昭等人的校本，足以称其资料丰富、考证详实，是《汉书》继颜师古注后到当时为止的最佳注本。清人李慈铭即曾称此书“采取矜慎，体例甚善，其附已见，亦俱精瑯，尤详于舆地”（《越縕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广陵书社2008

年均曾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排印出版。

除上述二家之外，关于《汉书》研究的前人著述亦颇为数目繁多。2008 年 8 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吴平、曹刚华、李珊珊合辑《〈汉书〉研究文献辑刊》。此书卷帙庞大，而内中即收入三十一家三十三种与《汉书》文本研究有关的著作，且多属世不经见。今为备忘起见，特条列细目如下：明凌稚隆辑《汉书评林》，明葛锡璠辑《汉书汇评》，宋倪思编、元刘会孟评、明凌稚隆补评《史汉异同补评》，清史珥撰《汉书剿说》，清洪亮吉撰《汉书发伏》，清姚鼐撰《姚氏汉书评点》，清朱一清撰《汉书管见》，民国吴汝纶撰《汉书点勘》，民国王浩撰《精校前汉书精华录》，中华书局编《汉书精华录》，清佚名撰《史汉一统》，清刘光蕡撰《前汉书校勘记》，清齐召南撰《前汉书考证》，宋吴仁杰撰《两汉刊误补遗》，清张恕撰《汉书读》、《汉书辨字》、《汉书常谈》，民国马叙伦撰《读两汉书记》，民国李澄宇撰《读汉书蠡述》，隋萧该撰、清臧辅辑《汉书音义》，清吴章澧辑《两汉韵珠》，汉许慎撰、清王仁俊辑《汉书旧注》、《汉书许注义》，清丁谦撰《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地理考证》，民国周正权编《汉书律历志补注订误》，民国梁启超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汉书诸子略各书有佚真伪表》、《考诸子略以外之现存子书》，民国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民国张骥《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民国叶长青撰《汉书艺文志答问》，民国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上述诸书之外，书末另有周保明编著《1949 年以来影印出版〈汉书〉文献目录》、《1911 年以来〈汉书〉研究论著目录》附录各一种。《〈汉书〉研究文献辑刊》所录，均为颜注之后的历代著述，而在此之外的又另有刘伯庄《汉书音义》、顾胤《汉书古今集义》、余靖《汉书刊误》、王棻《汉书补正》、周寿昌《前汉书注校补》、沈钦韩《汉书疏证》、钱大昭《汉书辨疑》、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等书为《汉书》研究的学术史注入了不断更新的内容。

迨至近代，近人杨树达《汉书管窥》（1954 年台北世界书局，1955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问世。该书在很多方面可补王氏本之不足，它与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4 月，中华书局 2008 年 6 月）一书均可算作今人在《汉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另有施之勉《汉书补注辨》（香港九龙新亚

研究所 1961 年)、岑中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 1981 年 2 月)、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施丁《汉书新注》(三秦出版社 1994 年 7 月)、张元济《汉书校勘记》(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等可供参考。1977 年,台北鼎文书局将周寿昌《汉书注校补》、陈直《汉书新证》合刊,题为《周陈二氏汉书补注合刊》。

2008 年元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沈元遗稿《〈汉书补注〉批注》。该书出自“文革”中蒙难早逝的学者沈元之手,其原迹最初于“文革”后,由沈氏生前故旧黎澍发现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丛刊》系列的《汉书补注》书内。“在这本书上,密密麻麻,沈元用蝇头小楷写下了自己的心得、批注。该书凡五八八一页,写有这样批注的就有三零八四页。其中还夹着许多单篇,那是较长或已基本成形的部分,大多写在检讨稿纸的背后”(沈蓓《七十周岁祭一代后记》)。全书八大册,正文前有沈君山《序》、刘导生《卷首语》以及梁英明、林被甸、朱一涛、蒋衍、何宗士、宗诒瑞、邱德仁诸人为纪念《〈汉书补注〉批注》出版而留下的亲笔题词手迹。

另外,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并记录了存世的书籍,而后世对它的研究也新著迭现。2009 年 7 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李万健、罗瑛辑《历代史志书目丛刊》,其中关涉《汉书艺文志》者,有以下十六种专著收入:(一)《前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唐)颜真卿注;(二)《汉艺文志考证》,(宋)王应麟撰;(三)《汉书艺文志辨疑》,(清)钱大昭撰;(四)《汉书艺文志考异》,(清)钱大昕撰;(五)《汉书艺文志正误》,(清)王峻撰;(六)《汉书艺文志注校补》,(清)周寿昌撰;(七)《汉书艺文志校证》,(清)史学海撰;(八)《汉书艺文志琐言》,(清)沈家本撰;(九)《汉书艺文志补注》,(清)王先谦撰;(十)《汉书艺文志条理》,(清)姚振宗撰;(十一)《汉书补注补正》,杨树达撰;(十二)《前汉书艺文志注》,(清)刘光蕡撰;(十三)《汉书艺文志考证》,(清)王仁俊撰;(十四)《汉书艺文志举例》,(清)孙德谦撰;(十五)《汉书艺文志辨伪》,(清)康有为撰;(十六)《汉书艺文志拾补》,(清)姚振宗撰。它们主要是对《汉书艺文志》的补作,除《汉书艺文志注补》与《汉书艺文志补注》各辑自单行本外主

要依据先前出版的《八史经籍志》（清同治癸未镇海张寿荣刻印）与《二十四史订补》、《二十五史补编》。除此书所收之外，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 1983 年 6 月）、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0 年 3 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与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三个单行本亦可供参考。另外，今人吴枫在其所撰《中国古典文献学》中，亦曾提到关于《汉书艺文志》的著述十七种，除上述已经列出的，还有王仁俊《汉书艺文志考证校补》（上海图书馆馆藏稿本）、张骥《汉书艺文志方伎补注》、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释》、许本裕《汉书艺文志笺》（《国故》1—4 期）、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隐》（稿本）、薛应绥《七略疏证》（《国故》2—4 期）、瞿润缙《汉书艺文志疏证》（抄本）、李笠《汉书艺文志汇注笺释》、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释例》（《积石丛稿》本，1946 年兰州排印）数种。2007 年 4 月，黄山书社出版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全面阐述了迄今为止《汉书·艺文志》的研究史。

《艺文志》之外，专注于表、志者，则又以研究《地理志》者为夥，而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在 1999 年 9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内，由李剑雄整理）、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2000 年 1 月北京出版社影印）、洪颐煊《汉书地理志水道疏证》、钱坫《新斠汉书地理志集释》、吕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2000 年 1 月北京出版社影印）、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2000 年 1 月北京出版社影印）、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吴承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刘文淇《汉书地理志稽疑》诸书皆可供参读。

《艺文》、《地理》之外，用力于表、志者，则更有若干专著行诸世间，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以上诸书凡未单行者，或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 1988 年 2 月）内，或在《二十五史订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内或在《二十五史三编》（岳麓书社 1994 年）内，而《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中华书局 1982 年）内亦有收录。

班固又是东汉前期著名的辞赋家，有《两都赋》、《答宾戏》、《幽

通赋》及《咏史》诗一首等名作，其中《两都赋》为最。《西都赋》假托西都宾客向东都主人夸长安昔日之繁盛富丽；《东都赋》则以东都主人的口吻极赞当今盛世，从光武定鼎到明帝修洛邑，从祭祀田猎到朝会宴飨，以突出东汉之声威。全篇体制宏大，文势辐辏，繁简得当。文中虽有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处，但其所辟京都题材及相关作品，又为后来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所法。清陆棻评比作“前篇以藻腴胜，而极烹炼之工；后篇以简实胜，而尽旋折之法。笔力劲，姿态丰，虽脱胎扬、马、固已出其范围矣”（《赋格》）。《咏史》则是班固的一首五言诗，咏汉文帝时事，“质木而无文”，缺乏形象性，但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全貌。在这些作品中，班固还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辞赋源于古诗，要求辞赋应有《诗》那样的讽刺作用，但又因当时社会较稳定而无形中却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的歌颂。他还从“润色鸿业”出发，把言语侍从之臣献纳和公卿作的辞赋说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些看法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要求和儒家正统的文学观点，对东汉后来辞赋的泛滥文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对后世文人影响不少。班固的上述辞赋作品，除被明人张溥辑为《班兰台集》外，先后还曾被南朝萧统收入《文选》、清代严可均收入《全汉文》等总集性的书籍中。

班固的作品，《后汉书》称：“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其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为十卷，皆亡佚。现存除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外，另有张燮《七十二家集》之《班兰台集》四卷、叶绍泰《增定汉魏六朝别解》不分卷本、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之《班孟坚集》三卷本和张鹏一《关陇丛书》之《兰台集》一卷等诸本行于世。以上五家，丁福保尝据溥本增删，而张鹏一亦对溥本作过订补，删《览海赋》、《游居赋》，又增《离骚序》。

2002年8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白静生《班兰台集校注》。该书以扫叶山房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班兰台集》为底本，参照经济堂刻本、信述堂本、张鹏一校补《扶风班氏遗书·兰台集》等作了校勘，又参照《昭明文选》、《后汉书》、《古文苑》等书有关注

释作了校注，《两都赋》注释另参考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无旧注者据个人理解予以注释，而无法注释或句读上有争议又不能解决者，暂且存疑。这是至今班集的第一部注本。

此外，关于班固文学成就的论著，今又另有孙亭玉《班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吴崇明《班固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二书亦可供参考。

《张河间集》

《张河间集》是东汉中后期著名文学家张衡的作品集。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南阳县北）人，生于78年（汉章帝建初三年），卒于139年（汉顺帝永和四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出任河间相，故世称张河间。他因精于天文历法而曾两次担任掌管天文的太史令，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发明制作了水运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又写出《灵宪》、《浑天仪图注》等科学著作，为我国天文学和地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出生时正当东汉帝国由盛转衰之际，宦官专政，贵族腐化，政治黑暗，故他虽有才能抱负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施展，且因敢于真言而遭宦党谗毁，郁郁不得志，遂于避患归隐之思。后“乞骸骨，征拜尚书，卒”（《后汉书·张衡传》）。

张衡还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其主要成就在赋和诗上，保留下来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有《二京赋》、《归田赋》、《思玄赋》、《南都赋》、《应间》及《四愁诗》、《同声歌》等。《二京赋》是他的代表作，据说“时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十年乃成”（《文选·李善注》）。它也是铺写长安、洛阳都市之景的，但规模更是宏大，为“长篇之极轨”的京都大赋，而且在内容及艺术形式上也均有自己的特色。从描写的内容上看，赋中除了宫室、林苑、祭祀、饮宴外，还增加了一些民情风俗中商贾、游侠、辩士、杂技、百戏等相关题材，扩充了辞赋的内容。如《西京赋》写到游历辩论之士时：“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痛。郊甸之内，乡邑殷赉。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楫，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轶接轸。”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市井风俗，又多少写出了市都的热闹；从表现手法上看，《二京赋》开铺叙之中插进议

论说理，直接进行品评褒贬，增加了讽谏的作用。如《东京赋》在历陈奢侈之非，前人爽德，以至王莽篡汉，圣皇光复等之后状况，评论说：“今公子苟好剿民以逾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殫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开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味旦不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臣济参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柝于东，西都颠覆而莫物。”这些语句相当大胆，且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崇尚奢侈、腐化堕落，以及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现实而发的，是作者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的吐露。正因为不少地方采取了这种夹叙夹议直接进行品评褒贬的表现手法，所以使全赋的讽谕之旨较为明显、切直。这些也都是不同于一般汉赋而显得较为充实的地方。虽未免烦冗，然对于后人研究汉代文化史确有重要价值。清孙执升曾赞此作“搜辞宏富，布采陆离，洵足追班（固）轶左（思）”（《评注昭明文选》）。

《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他以清新的笔调描绘了田园风光的优美可爱，表现他在宦官专权、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而欲归隐田园以求安适恬淡的情怀，而这也正与朝廷当时充斥的昏庸黑暗、勾心斗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赋篇幅短小、文辞清丽且骈偶相间，“寥寥二百字而有无尽之藏”（《读汉文记》），并扫以往同类作铺采摘文，板滞模拟虚夸堆砌之朽气，从而充分表明它已摆脱“閤侈巨衍”的大赋体制而开东汉抒情小赋先河，对魏晋以后抒情赋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他无愧于被誉为“承前启后的赋家”的称号。

此外，他还有以《同声歌》和《四愁诗》为突出代表的一些五、七言诗。其中《同声歌》因明显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法，而“雅有新声”（《文心雕龙·明诗》）。它体裁上使用了五言句式，在笔法上则使用一个好自叙的口气，从而既传神地写出了她新婚之夜的有惊有喜，“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汤”，又通过间接的独白表现出自己的勤劳能干，还利用形象的比喻把自己对丈夫的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心愿婉转地传达给了对方，“思为莞蒹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裯，在上卫风霜。”结尾部分展示自己的美好体态和新婚之乐则更是大胆、坦率。其措辞之奇妙，兴寄之高远，在东汉文人五言诗中别具一格。《四愁诗》则是一首七言抒情诗，共有四章，继承了先前《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而分别以“我所思兮在太（即泰）山”“我所思兮

在桂林”、“我所思兮在汉阳”、“我所思兮在雁门”开头来抒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及因无法实现的失意与忧伤，写得意绪绵绵，又法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而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故又分别于“四愁”之末以“路远”及“何为怀忧”结尾，中间又分别间以“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等语寓希望于其中，显得慷慨情深，对七言诗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清沈德潜赞其“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古诗源》）。

张衡的文集，《隋书·经籍志》著为十一卷，又“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俱作十卷，《宋史·艺文志》则作六卷，均已佚。目前，他的作品除存于范晔《后汉书》外，还曾被萧统辑其作品六篇入《文选》。后来，又分别被明张燮、张溥和清叶绍泰收入《七十二家集》、《汉魏百三名家集》和《增定汉魏六朝别解》中而被再次加以整理、补充，使后人受益匪浅。其中溥本收录为二卷，姚际恒《好古堂书目》有著录；燮本为六卷又附录一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有著录，并注云：“九行十八字，鱼尾下记字数。前有霏云主人张燮序。”叶本则不分卷。另，清人严可均又据溥本重加辑录，分四卷，内容互有增损，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按：张衡现存诗文，除《鸿赋》已为后人考证乃卢思道《孤鸿赋序》的一部分，而所谓的《鸿赋序》亦并未见录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张河间集》。

198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本书所收，录自《文选》、《后汉书》以及《艺文类聚》，而《灵宪》、《浑仪图注》、《漏水转浑天仪注》、《玄图》等四篇天文学专著之外，凡诗五首，赋十三篇，文、书各二篇，铭、诰、赞各一篇，疏十三篇，专从文学角度出发，据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与近人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再参以他书，删补并合，完残俱收，共涉赋、文、铭、诰、谏、赞、书、上疏七种文体，录张衡所撰韵散诗文三十七篇（其中《鸿赋》疑非衡作，而《上事》所残存之两语实为两篇），并加校注，并在校注合一的同时，除传统形式上的训诂、释义、考证之外，对许多生僻文字还加注了现代汉语的拼音。书前有《前言》，内中共述及“张衡生平”、“张衡的学术贡

献”、“张衡的政治思想”、“张衡的著作存佚”四个方面的问题，在《前言》之前，另有王弘力所作《张衡造像》一幅，而书后在《后记》之前又有《张衡年表》与《后汉书·张衡传》、《河间相张平子碑》两种附录。

《吴越春秋》《越绝书》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赵晔之手的一部历史散文集，同时也是汉晋以来保留较完整的一部具有演义类雏形的历史小说。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明帝到和帝时期（即公元58年至公元105年间）。“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在今四川），诣杜抚受韩诗（韩婴传《诗经》），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晔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有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后汉书·儒林传》）。

《吴越春秋》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主要是讲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其书今存十卷，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因为汉视吴为周的支派，故写吴国的称为“传”或“内传”，有《吴太伯传》、《吴五寿梦传》、《王僚使公子光传》、《阖闾内传》、《夫差内传》；而越虽为夏禹后裔，但因地处蛮荆偏远之地，故其有关部分被称为“外传”，有《越王无余外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灭吴外传》。

《吴越春秋》中所叙事件虽都明确标示了实际并不准确的年代，并且文章均以“传”为名，但由于行文上有类于《史记》之本纪、世家之处，因此该书一方面在体例上兼有了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可视其为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吴越春秋》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据前人有关论述如明钱福所言此书“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重刊吴越春秋序》）可知，该书中的许多故事在正史中也有记载。不过，作者在把它们写入书中时并未去直接地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想象的自我发挥又增入了许多生动的细

节。如伍子胥奔吴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记·伍子胥列传》总计只用了一百余字的篇幅,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在这里,这两件事的有关叙述却有了长达六七百字的篇幅,单就渡江一事就增加了躲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事中也出现了击绵女的形象,并对她的身世节操作了详细的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马迁没有点明;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为保护伍子胥而相继自杀,当然击绵女的自杀还有保全自己节操的考虑。和《史记》相关记载相比,《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仅文字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确富有小说的特征与魅力。不仅如此,《吴越春秋》中相当一部分情节更是前人著作中所没有的。如《阖闾内传》开头写伍子胥为吴王阖闾修城铸剑,又有人为吴王造金钩,显得曲折离奇,耐人寻索。接着作品又写了伍子胥为巩固吴王阖闾的地位而找来刺客去行刺王僚的儿子庆忌的故事。要离虽“迎风则僵,负风则伏”而极其单薄虚弱,但却是个了不得的大勇士。作品通过伍子胥之口叙述了要离当年折辱椒丘欣的一段经历:椒丘欣者,东海上人也,为齐王使于吴,过淮津,欲饮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见马即出,以害其马,君勿饮也。”曰:“壮士所当,何神敢干!”乃使者饮马于津。水神果取其马,马没。椒丘欣大怒,袒褐持剑入水,求神决战,连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吴,会于友人之丧。欣恃其与水神战之勇也,于友人之丧席而轻于士大夫,言辞不逊,有凌人之气。要离与之对坐,合坐不忍其溢于力也。时要离乃挫欣曰:“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与神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勇,勇士所耻。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犹傲色于我哉?”于是椒丘欣卒被诘责,恨怒并发,瞑即往攻要离。于是要离席阑至舍,诫其妻曰:“我辱勇士椒丘欣于大家之丧,余恨蔚悲,瞑必来也,慎无闭吾门。”至夜,椒丘欣果往,见其门不闭,登其堂不关,入其室不守,放发僵卧无所惧。欣乃手剑而掖要离曰:“子有当死之过者三,子知之乎?”离曰:“不知”。欣曰:“子辱我于大家之众,一死也;归不关闭,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过,欲无得怨。”要离曰:“吾无三死之过,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欣曰:“不知”。要离曰:

“吾辱子于千人之众，子无取报，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二不肖也；前拔子剑，手挫捽吾头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肖不而威于我，岂不鄙哉？”于是椒丘欣投剑而叹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觊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类于这样细致、生动而又不失离奇的描写，可以说到当时为止还是前所未见的。即使此前以人物、情节著称的《史记》也没有它这样的婉转周折、引人入胜。于是吴王召见了要离，王曰：“庆忌，明智之人，归穷于诸侯，不下诸侯之士。”要离曰：“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王曰：“诺。”要离乃诈得罪出奔，吴王乃取其妻子焚弃于市。要离乃奔诸侯，而行怨言，以无罪闻于天下，遂如卫，求见庆忌。见曰：“阖闾无道，王子所知，吾知其情，愿因王子之勇，阖闾可得也，何不与我东之吴？”庆忌信其谋，后三月，拣练士卒，遂之吴。将渡江，于中流，要离力微，坐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要离渡之江陵，愍然不行，从者曰：“君何不行？”要离曰：“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义；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于江。未绝，从者出之。要离曰：“吾宁能不死乎？”从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禄。”要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上述文字中描写定计的委婉曲折，尤其是描写这个瘦小之人行刺大勇士时的具体动作，真可谓精妙至极；而最后结局的处理更突出地表现了两个勇士的侠义精神，加强了故事的悲剧性。综上所述，《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揉合在一起而得的，虽然其中的某些情节是作者的想象所得，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而它的荒幻离奇，是在其对那确曾存在的人物和事件所构成的正史加以演绎的同时，对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又加以吸收、运用后的所